

“解放全中国”：伟大口号从陕北喊过长江 声震全中国

钩 沉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947年，中国命运的十字路口，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战斗号召。

从黄土沟壑中飞出的口号，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激励着军民斗志。一时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这句口号是怎样喊出来的？在建党百年之际，重走转战陕北之路，我们在黄土地追寻答案。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两座大山山脚下，坐落着延安王家坪革命旧址。这里曾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驻地，如今旧居罗列，参观者络绎，却一片祥和井然。

时光回溯至70多年前，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纠集大军进攻延安城的枪炮声，打破了王家坪的宁静。

当时，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师)，共23万余人，由胡宗南等率领，妄图一举占领延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仅有不足3万人。一时间，“希望之城”延安告急！

“面对国民党军的来势汹汹，有同志表示要誓死保卫延安。但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副院长杨晓红说，“当时好多人不理解，毛泽东就给大家做解释工作。他说，留人失地，人地皆存；而留地失人，人地皆亡。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来换取全中国，不要在乎这一城一池的得失。”

也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坚持要“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而毛泽东再次站在全局的视角，明确指出自己不能走，并要求党中央也最好不要走，从而达到拖住胡宗南为其他地方争取有利条件的目的。最终，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就从王家坪出发，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

光明在前 笑声从不曾消失

夏日的灿烂阳光，透过窗棂照射在延安市安塞区王家湾革命旧址的窑洞中。炕桌、油灯、被褥等陈列在内，一如往昔。1947年4月，转战中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在这里停留了58天。窑洞内的墙上，挂着毛泽东的题字——“光明在前”。

这是在王家湾驻时，应任弼时女儿任远志的要求，毛泽东所题写的。转战之路险象环生，困难时刻，这题字却如此坚定，给人无限鼓舞。

从延安撤离，毛泽东便化名李德胜，取“离得胜”之谐音，也就是“离开以后取



安塞区王家湾革命旧址内陈列的旧物件。

得胜利”的意思。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

“从安塞到靖边，面对敌人四个半旅的追击，在小河几乎和敌人迎面相遇。在天赐湾，毛泽东按兵不动，唱出了一出‘空城计’，让敌人顺沟过去。在佳县，敌人10万兵马南北扑来，大雨连绵，河水猛涨，面对渐渐逼近的敌兵，毛泽东毅然决定沿着葭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脱离险境……尽管辗转劳顿、危险重重，但丝毫不影响毛主席对前途的信念、对胜利的信心。”延安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张建儒说。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下，我军运用“蘑菇战术”与敌巧妙周旋、牵制，并歼灭其有生力量，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郭吉成时任中央警备团战士，据他回忆，转战中尽管有艰难、有危险，战士们有时会感到非常紧张，但他们从不曾感到消沉，从不曾产生过失望。

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对战争必胜的信心，时刻都在激励着全体军民。正是有了这个信念，毛泽东等领导人虽处一隅，却始终放眼全国；虽居险难，却永远心向光明。

而转战陕北的结局也正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仅仅一年多，敌人在损失兵力10万余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北，落了个“人地皆失”的局面。

人民就是江山

为什么陕北群众会如此拥护共产党？在杨晓红看来，这是因为共产党心中同样装着群众。

“我们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1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为老百姓谋福利。老百姓得了实惠、得了好处，自然觉得共产党好，自然心甘情愿听党的话、跟党走。”杨晓红说，“真正赢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恪守了自己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才可能一切依靠群众。”

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党的领导人总是惦记着群众。1947年6月7日中央撤离王家湾时，转移方向确定了，毛泽东对警卫人员说：“马上通知村干部，让乡亲们跟上部队撤离。”

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中央机关的行踪，建议不要把部队的行动告诉老百姓。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意见，他指出：“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我们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一定要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乡亲们跟上部队转移。”

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赢得了陕北人民的真心拥护。在安塞王家湾村，村民们向记者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党中央从王家湾撤离之后，国民党进驻王家湾，老百姓坚壁清野之后，全部搬到山上。毛泽东的房东薛老汉被抓住以后，被国民党刺掉手指，也没有说出毛泽东他们的去向。

在王家湾村民高庆凯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的身影。“父亲牺牲时，我才一岁。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高庆凯说。转战中，他的父亲志愿为部队抬担架，刚去了20多天，就牺牲在羊马河战役中。

在子长县余家坪乡羊马河战役烈士纪念碑上，我们找到了高庆凯父亲高焕明的名字。上面刻着：“高焕明，男，汉族，1917年出生，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坪桥镇王崾湾村人，担架队队员，1947年在子长县羊马河战役中抢救伤员牺牲。”羊马

河战役中，我军以伤亡479人的代价，毙伤俘敌4700余人。

高焕明的尸体被拉回到村子后，毛主席正在王家湾。村子里给高焕明开了追悼会，当时中央警备团、王家湾的官兵都参加了，毛主席也参加了高焕明的追悼会。在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中，群众是铜墙铁壁，人民就是江山。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疯狂反扑也未能挽救国民党在各个战场的溃败。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再经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决定战争进程的主动权开始转入共产党人手中。

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12万大军一举强渡黄河天险，随后挥师千里进军大别山，由此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不久，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挥戈西进，三支大军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创建了江淮河汉之间新的中原解放区，完成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任务。

1947年10月，在佳县神泉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并于10月10日颁布，响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喊出这句口号5个多月后，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的中央纵队，从吴堡县东渡黄河，前往河北西柏坡。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川口村渡口东渡黄河。历时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结束，中国革命进入新的篇章。在抵达东岸的山西后，毛主席下船回望对面苍茫的陕北大地，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黑白老照片定格的一瞬间中，老船工薛海玉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手里拿着旱烟袋，如陕北大地一般沟壑纵横的脸上绽放着淳朴的笑容。73年前的料峭春寒中，薛海玉撑着木船将毛泽东摆渡过黄河。那天浑浊的黄河水比以往平缓，但依然夹杂着冰块撞击船身。薛海玉凭丰富的经验避开了漩涡和险滩，让木船顺利靠岸。

彼时的薛海玉没有意识到，自己亲身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1935年10月落脚陕北时，中央红军仅剩7000余人；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时，人民军队兵力已达280万，解放全中国胜利在望。

在宣言发出之时，我军已着手进行战略反攻，历52天的辽沈战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1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句口号也就随着三大战役的推进，从北到南，越喊越响亮，一路喊过长江，喊到南京。 □贺占军

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即宗族间要相互帮助；“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即为人处世要知道进退得失，防止走极端。

家训家教带有终身教海的特质，因而也可以成为国家培养道德之民、法律之民、智慧之民的参考教材。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全社会都应该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优良家训家教世代相承，必将有助于完善基层治理、形成良好政风，必将有助于社会文明和谐、国家繁荣进步。 □钱汉东



谢子长

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一位烈士的遗骸移葬于其家乡枣树坪。毛泽东先后两次为其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这位烈士，就是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谢子长。

谢子长，1897年生，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投笔从戎、立志“以武装打垮旧世界”的谢子长，来到政治倾向进步的石谦旅的一个团里任连长，并在该团秘密发展中中共党员，建立中共特别支部。他对士兵们的生活关怀备至，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以改善战士们们的生活，深得大家的拥护与爱戴。谢子长率部驻防安定时，还十分注重维护军民关系和群众利益：不侵占民房；公审当地大土豪，为贫苦工农平反冤屈，并宣布废除苛捐杂税……这些举措，使土豪敛迹、贪官胆寒，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谢青天”。

1927年10月，谢子长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31年10月，他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二年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4年，谢子长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这年8月，在河口战斗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胸部被敌弹击中。虽然身负重伤，但他坚持不下火线，忍着剧痛指挥作战，直至部队大获全胜。此后，谢子长不愿离开自己心爱的战斗岗位，仍旧带伤坚持工作。同志们担心他的伤势，却谁也说服不了他去歇一歇、养一养。这年九月间，谢子长自感身体实在支撑不住，才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离家不远的杨道村休养。养病期间，他仍不忘关心游击队的战况和战士们们的生活。

快到春节时，谢子长伤势日趋严重，外甥去看望他，他记挂的还是那些战士们：“兵们怎么过年？”外甥说：“已准备肉和白酒。”谢子长嘱咐道：“一定要让同志们吃好些！”他还悲痛地说：“我给老百姓做的事太少了！”1935年2月21日，由于病情恶化，谢子长不幸与世长辞，时年38岁。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烈士修建了陵墓，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公葬仪式，毛泽东第三次为其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 □谢文雄

人物春秋

宋人岳飞，系南宋抗金名将，他一生戎马生涯，功勋卓著，是永垂不朽的英雄。他以武功著称，不唯如此，经纶外，诗词餘事，亦是颇得称誉。 他留下的三首词作，忠愤可见。最著名者为《满江红》(怒发冲冠)，另两首一为《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一为《小重山》，皆是忧国忧民忧时之作。且以《小重山》而言，在宋时，对词中的“瑶琴”和“瑶箏”便有了不同的版本。宋时流行版本曾有云：

“昨夜寒愁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琴”，并非该词的韵字。其韵字，上半阕是：“鸣”“更”“行”“明”，下半阕是：“名”“程”“听”。这显然与《小重山》的韵脚相悖。

《小重山》，又名《小重山令》，双调，五十八字，上下阕各四平(声字)韵。它是以唐末薛昭蕴《小重山》(春到长安春草青)为正本。薛词的下半阕云：“愁极梦难成，红妆流泪宿、不胜情。手挪裙带绕花行，思君切，罗幌空暗生。”这下半阕就是四平韵(“成”“情”“行”“生”)。而偏偏岳飞的《小重山》下阕却只有三韵，自与《小重山》格律不符。

所以，宋代的陈郁发现了“琴”字韵脚不谐。《历代诗餘》卷一百十七引陈郁《藏一话腴》云：“(岳)武穆贾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谿壑之求。’爷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爷盖指和议之非也。”“箏”与“琴”皆弦乐器，易以“箏”字，事谱矣。所以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中，就将其中的“瑶琴”改作“瑶箏”。

而时下流行的选本中，却依然有错用“瑶琴”者，上海辞书出版社《宋词鉴赏辞典》和江苏古籍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也是错误用了“瑶琴”版的《小重山》，而后者对“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作这样的“鉴赏”：“结拍三句，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表达自己处境孤寂，缺少知音，深感寂寞的心情。据《吕氏春秋·本味》，春秋时俞伯牙善鼓琴，唯有钟子期能从琴声中体会出他的心事。后来‘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说到诗餘，也须说一下古诗文的异文和讹误。因多所致，古书中的雕版印刷中，便有了异文，极突出的，便是苏轼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的异文竟达六处。据朱彝尊《词综》卷六，计有：“浪淘尽”作“浪声沉”，“周郎”作“孙吴”，“烈”作“掠”，“强虏”作“檣櫓”，“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作“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如梦”作“如寄”。这是朱彝尊从《容斋随笔》所载黄鲁直(庭坚)手书本所录而记之。从严格意义上讲，异文不算错误，只是因版本原故所致。因其未涉及到韵字的更换，故而只视作异文罢了。

当然，异文中也有涉及到韵字的，如王维《渭城曲》前两句，通行本作“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而《全唐诗》中却作“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杨柳春。”“柳色新”和“杨柳春”尽管韵字有异，然而，“新”和“春”都是押“真”部韵，只能算作异文。至于本文所谈及的“琴”和“箏”，二字因韵部不同，故必有一字是错。“琴”字未押该词的字韵，故非异文，而只能视作讹误。 □杨乾坤

语林指瑕

应是『欲将心事付瑶箏』

往 事

微言大义的《钱氏家训》

纂的《庆系谱》到近代钱文选编辑的《钱氏家乘》，都传承了这一精神特质。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是江南钱氏杰出的代表。钱学森曾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他的父亲钱均夫则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钱三强选择学习原子物理学，在法国留学期间静心刻苦学习，都不同程

度得益于长辈的教导、家族的教育。

一部《钱氏家训》，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篇章，共634字，可谓微言大义。它集儒释道之精华，蕴藏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智慧，既饱含家国情怀，又便于子孙后代操作，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范本。

具体来看，《钱氏家训》的主要内容有“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即人要有大格局和胸怀天下；子谋

韩子佩担任绥榆保安十二团团长，张道源任团副。因看不惯韩子佩的张扬跋扈，又受李鼎铭的影响，所以借故离开韩子佩回了家。1944年，子洲县首届会议上，他被选为常驻参议员。

1949年，他困居西安，在保六旅任副官，领一份军饷，并已起义。

劝降遇害

张道源听说韩子佩盘踞华山与人民为敌，认为凭他和韩子佩的交情，可以说服韩子佩放下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荔军分区、渭南军分区联合司令部领导权衡利弊，答应了一张道源的请求。5月底，张道源带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当时大荔地委书记刘文蔚的信，准备上华山。

当张道源来到华山脚下时，韩子佩正好接到胡宗南给他发来的电报，要他据险

坚守，并给韩许愿升官。当山下电话报告张道源要求面见韩旅长，有事商谈，韩子佩知道张道源上山来一定是劝他投降的。他害怕军心动摇，遂传话山下不予接见，并暗示将道源处死。

《华阴县志》(1995版)记载：“时韩子佩原旅部参议张道远携中共大荔地委书记刘文蔚劝韩投降信来华阴。路东总队派孟俊甫陪张上山送信，张在青柯坪向韩部营长说明来意。缩居西峰的韩子佩接电话后，下令将张、孟二人就地处决。张被杀害，孟借机逃跑，从仙峪返回县城。”可《华山志》(2005版)在“名人与华山篇”里，只记载了为解放华山作出贡献的刘吉尧与王银生两人。

平反昭雪

令人惋惜的是，因种种原因，半个世